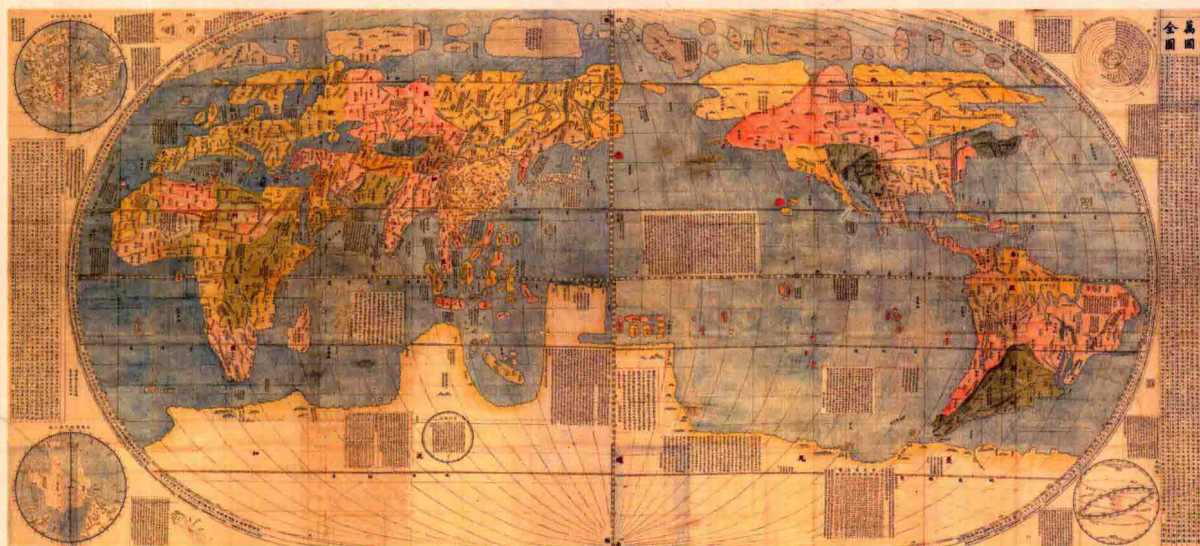


01 / 第一辑

Global History
and China
李雪涛 顾彬 主编

全球史 与中国



- 德语地区中国历史研究的起源
- 沃尔科特与清华
- 巴色会与太平天国
- 重建独白空间中的东西文化对话语境：以辜鸿铭
致卫礼贤的21封信为中心
-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位德国牧师笔
下的中国
- 托尔斯泰眼中的中国贤哲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与中国 全球史

01/ 第一辑

Global History
and China

李雪涛 顾彬 主编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史与中国. 第一辑 / 李雪涛, 顾彬主编. — 郑州 :
大象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5347-9498-8

I. ①全… II. ①李… III. ①世界史—研究
IV. ①K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18912 号

全球史与中国 第一辑

QUANQIUSHI YU ZHONGGUO DIYIJI

李雪涛 顾彬 主编

出版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耿晓谕

责任校对 牛志远

封面设计 刘民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5597936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42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南六环磁各庄立交桥南 200 米(中轴路东侧)

邮政编码 102600

电话 010-61264834

《全球史与中国》编辑委员会

学术顾问

巴斯蒂 (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	腊碧士 (Alfons Labisch)
蓝哈特 (Wolfgang Reinhard)	李伯重 (Li Bozhong)
吕 森 (Jörn Rüsen)	米亚斯尼科夫 (V. S. Mjasnikov)
彭 龙 (Peng Long)	

学术委员会

波波娃 (Irina F. Popova)	伯 克 (Martin Burke)
戴默尔 (Walter Demel)	傅敏怡 (Michael Friedrich)
耿 昇 (Geng Sheng)	耿相新 (Geng Xiangxin)
金国平 (Jin Guoping)	李剑鸣 (Li Jianming)
廉亚明 (Ralph Kauz)	刘北成 (Liu Beicheng)
刘家峰 (Liu Jiafeng)	刘晓峰 (Liu Xiaofeng)
刘新成 (Liu Xincheng)	刘悦斌 (Liu Yuebin)
刘岳兵 (Liu Yuebing)	内田庆市 (Uchida Keiichi)
欧阳平 (Manel O. Rodríguez)	培高德 (Cord Eberspächer)
彭小瑜 (Peng Xiaoyu)	沈国威 (Shen Guowei)
施耐德 (Axel Schneider)	石云涛 (Shi Yuntao)
宋 岷 (Song Xian)	孙 江 (Sun Jiang)
孙立新 (Sun Lixin)	孙来臣 (Sun Laichen)
孙有中 (Sun Youzhong)	汤开建 (Tang Kaijian)
唐日安 (Ryan Dunch)	王邦维 (Wang Bangwei)
王刘纯 (Wang Liuchun)	王马克 (Marc Matten)
夏多明 (Dominic Sachsenmaier)	张国刚 (Zhang Guogang)
章 清 (Zhang Qing)	

主 编

李雪涛 (Li Xuetao)	顾 彬 (Wolfgang Kubin)
-----------------	----------------------

副 主 编

柳若梅 (Liu Ruomei)

执行编辑

顾 杭 (Gu Hang)

主 办

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
(Institute for Global History,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目 录

■ 《全球史与中国》发刊词

李雪涛 001

名家寄语

■ 全球史与中国

——一种合乎时代的、探究世界发展的路径

[德] 腊碧士, 罗颖男译 007

论 文

■ 德语地区中国历史研究的起源

[德] 裴古安, 韦凌译 010

沃尔科特与清华

陈怀宇 035

巴色会与太平天国

罗颖男 070

大师的“对话”：鲁迅与托尔斯泰

柳若梅 090

重建独白空间中的东西文化对话语境：

以辜鸿铭致卫礼贤的 21 封信为中心

吴思远 098

卫礼贤 1914 年版《中庸》首译稿初探

徐若楠 王建斌 124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一位德国牧师笔下的中国佛教

——海因里希·哈克曼对中国佛教的考察和研究

王婉秋 136

托尔斯泰眼中的中国贤哲

——以托尔斯泰个人藏书为中心

[俄] 加莉娜·阿列克谢耶娃, 罗薇 王嫣婕译 158

■ 法国汉学家白乐日及其国际视野

耿 昇 167

书 评

■ 读《中国人信札》，看 18 世纪法国的“中国热”

张 放 188

富布卢克及其《剑桥德国史》

李雪涛 193

全球史的包容与互动

——《世界的演变——19 世纪史》

温 馨 197

旁行而不流

——读《讲授〈易经〉之道》

吴礼敬 200

全球史视野下中英动人心弦的交往历史

——读《塞尔登的中国地图》

庄超然 204

Contents

■ From the Editor-in-Chief	By Li Xuetao	001
----------------------------	--------------	-----

Voices

Global History and China: A Timely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Our World	By Alfons Labisch	007
--	-------------------	-----

Featured Articles

The Beginnings of Historical Oriented Chinese Studies in German-speaking Countries	By Andreas Pigulla	010
Gregory Dexter Walcott and Tsinghua	By Chen Huaiyu	035
The Basel Mission and the Taiping Movement	By Luo Yingnan	070
“Dialogues” between Masters: Lu Xun and Leo Tolstoy	By Liu Ruomei	090
Monologues and Dialogues across Cultures: Letters of Gu Hongming to Richard Wilhelm, 1910–1914	By Wu Siyuan	098
Translating the Classics with the Classics: A First Investigation into Richard Wilhelm’s Manuscript of <i>Zhongyong</i> in the Year 1914	By Xu Ruonan & Wang Jianbin	124
Portraying Chinese Buddhism in the Late 19 th and Early 20 th Century: Heinrich Schliemann and Chinese Buddhism	By Wang Wanqiu	136
Leo Tolstoy’s View of Chinese Sages—Focusing on His Private Library	By Г. Алексеева	158
The Historian Etienne Balazs: His Research and His Vision	By Geng Sheng	167

Book Reviews

Marquis d’Argens: <i>Les Lettres chinoises, ou Correspondance philosophique, historique et critique entre un Chinois voyageur et ses correspondants à la Chine, en Moscovie, en Perse et au Japon</i>	By Zhang Fang	188
Mary Fulbrook: <i>A Concise History of Germany</i>	By Li Xuetao	193
Jürgen Osterhammel: <i>Die Verwandlung der Welt. Eine Geschichte des 19. Jahrhunderts</i>	By Wen Xin	197
Geoffrey Redmond & Tze-ki Hon: <i>Teaching the I Ching (Book of Changes)</i>	By Wu Lijing	200
Timothy Brook: <i>Mr. Selden’s Map of China</i>	By Zhuang Chaoran	204

《全球史与中国》发刊词

李雪涛

跟以往分裂来研究世界各个部分以及不同领域的世界史相比,全球史研究打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以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的历史现象为研究对象。全球史学科的观念,同时也打破了在中国史和世界史之间的学科界限,从而将中国史纳入全球史之中进行整体研究。

大航海以来,欧洲习惯于将自身的利益通过国家或宗教的意识形态扩展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这是现代性的一个特点,同时也形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贸易。世界贸易体系的形成,使得世界资源得以重新分配,欧洲的技术得以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民族国家的形成,使得西方国家通过签订各种合约确定主权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对于以欧洲为中心的殖民扩张来讲,世界的其他部分存在仅仅是一个“海外”的存在而已。全球史学科的建立,在于以跨文化互动的发展,来破除欧洲中心主义的论点。以往以欧洲的历史经验作为其他社会发展程度标准的尺度的做法,已经被当今学界所摒弃。作为全球史之父的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 1917—2016)认为,“与外来者的交往是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动力”^①,因为特别是与异质文化的接触与交往,往往会引起对很多约定俗成惯例的调整。历史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与外来者的交往而引发的,也正是这一动力,推动着欧亚共生圈(ecumene)的形成和发展。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 1922—1968)甚至认为,“西欧的演变取决于欧亚非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过程”^②。

① 麦克尼尔:《变动中的世界历史形态》,见夏继果、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21页及第45页。

② 霍奇森:《历史上各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见夏继果、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43页。

全球史的理念超越了以往人们看待世界和空间的方式。尽管现代性产生于西方,但却是在西方与其他异质文明的接触中产生的。芝加哥大学的德裔欧洲史教授盖耶(Michael Geyer, 1947—)和芝加哥的另一位历史学家布莱特(Charles Bright)甚至认为,作为一种反作用力,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非西方国家,才是产生全球一体化的力量源泉,正是它们在一体化进程中让世界逐渐融合,而世界各地的历史也因此同世界历史产生了关系。^①

作为方法论和研究对象的全球史实际上是一个上位的概念,也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广阔学术领域,任何人都没有办法穷尽这之中的所有学问。《全球史与中国》仅仅是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以上全球史与中国的各个研究领域的成果进行整合,以期中文世界的读者能够看到一些全球史与中国的研究成果。《全球史与中国》这一题目,并非某一学科的某一人可以从事的专业,它必然是不同专业、不同学科的学者积极参与及密切互动的结果,同时它也必然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初见成效。

法国年鉴学派著名的历史学家费弗尔(Lucien Febvre, 1878—1956)早就意识到,一种封闭的学科在当代是毫无价值、毫无生命力的,他指出:“所有的发现都不是发生于每个学科的内部及核心,而是发生于学科的边界、前沿、交叉处,正是在这些地方,各个学科互相渗透。”^②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在他的自传中描述自己在答辩时的表现时写道:“我已经学会了如何成为历史学家中的汉学家,以及稍加变化,又成为汉学家中的历史学家。很像一个不易被抓住的中国土匪,处在两省辖地的边缘,一边来抓便逃到另一边。”^③在历史学和汉学的交界处、边缘进行研究,力求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这其实也是费正清之所以能另辟蹊径,成就美国中国学的原因所在。而我们创办的《全球史与中国》,特别需要这种在知识和方法论方面交叉拓展的刺激。

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1902—1985)提出“总体史”(l'histoire totale),一再强调历史的总体性,认为一切的人、事件只有放到历史的总体背景中去考察才有意义,才能得出相对科学的结论。中国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一旦将中国放在全球史的大的背景下来看待的话,中国研究所蕴藏的无限可能性就会显现。拿中国近代留学史来讲,只有将中国的留学研究放在近代社会发展以及全世界的留学运动中,才能够凸显出其价值和意义。章清曾撰文探寻以容闳(Yung Wing, 1828—1912)、严复(1854—1921)和胡适(1891—1962)为代表的三代留学生的思想轨迹,认为他们以集体的方式去美国和英国

① 盖耶、布莱特:《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历史》,见夏继果、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2~202页。

② Lucien Febvre, *Combats pour l'histoire*. Paris: Armand Collin, 1953, p.30.

③ 费正清(J.K.Fairbank):《费正清自传》,黎鸣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0页。

留学,从而融入世界潮流之中去,其后又纷纷踏上了一条异常艰难的回归之路^①。此外,留学并不仅仅是一个中国特有的现象,留学对于现代国家的形成,以及现代学术的兴起,都曾起到过重要的作用。19世纪,美国就曾有过派出超过一万名留学生到德国洪堡大学留学的先例。^②美国不仅借鉴了德国大学的模式,而且对之进行本土化改造,融合英式学院于一体,形成了美国独特的办学模式。日本和俄国也都曾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到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的著名大学留学,回国之后的这批留学生的成就,也大大推动了这两个国家的大学体制乃至社会的发展。

二

早在1919年,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就明确地提出了新思潮和新文化的纲领,亦即“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③在四大步骤中,“输入学理”便是要引进异域(当时主要指西方)的文化和哲学理论,目的是在与其他文化的交融中创造出经过改造的中国文明,亦即在传统的基础上走向未来。按照胡适当时的理解,输入学理的重要性,在于在认识和接受一些普世理论的同时,反省、更新自己的文化,为的是重新确定中国文化作为主体身份的价值和位置。今天来看,“输入学理”的深层含义还在于认同和接受普世性的价值观念,胡适并不认为这种认同意味着为西方所同化,而是本土文化的“再生”——在自我与他者的对话中,逐渐恢复自身传统的价值体系,使之适应于世界当今和未来的发展。实际上胡适的纲领除了起到构建起中国文化的新体系作用,也为解决文化出路问题提供了中国的基本经验。

从根本上来讲,全球史所强调的是全球范围内的互动。《全球史与中国》所涉及的内容,实际上是对大航海以来中国人与不同地域、民族、文化的人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所形成的互动情况的考察。除了通史性、区域性全球史与中国的研究成就,本刊收录的文章也包括世界与中国的专题性研究,包括贸易史、移民史、传教史、语言交流史、知识迁移史、科技史、疾病史、概念史、翻译史、留学史等内容。之所以有这些专题,是与法国年鉴学派所倡导的“问题史学”相关的,年鉴学派强调“分析”“提问”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刘新成列出了西方全球史学者所表达的互动模式的八种形式:1.阐述不同人群

① 章清:《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对〈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的追踪》,见《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6期,第122~160页。

② Cf. John S. Brubacher and Willis Rudy, *Higher Education in Transition. A History of American College and Universities, 1636-1976*. Piscatawa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7, p. 175.

③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见《学问与人生》,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第86~93页。

“相遇”之后,文化影响的相互性和双向性;2.描述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各种类型的“交往网络”或“共生圈”;3.论述产生于某个地区的发明创造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4.探讨“小地方”与“大世界”的关系;5.“地方史全球化”;6.全球范围的专题比较研究;7.生态史、环境史研究;8.探讨互动规律与归宿。^① 上述专题都可以归纳到刘新成所列的互动模式之中。美国历史学家本特利(Jerry Bentley, 1949—2012)就认为世界史(全球史)所考察的是“超越了民族、政治、地理或者文化等界限的历史进程。这些历史进程已对跨地区、大洲、半球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各种事物都产生了影响,其中包括气候变迁、物种迁移、传染病蔓延、大规模移民、技术传播、帝国扩张的军事活动、跨文化贸易、各种思想观念的传播以及各种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延展”^②。正是通过全球史与中国的研究,才能看到今天的中华文明是与不同文化交流的结果,并揭示出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

我们坚持翻译文章和用汉语写作的论文并重的原则。梁启超(1873—1929)曾认为:“今日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矣。”^③当时有人认为可以用译书来拯救中国。比梁任公早三个世纪的徐光启(1562—1633)就提出了“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的主张^④。徐光启的目的也是为了“超胜”。我们认为,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早成了世界的一分子,而从世界学术界汲取营养,与各国学术界进行交流的活动,永远也不会终结。在强调去中心化和互动的今天,冷战时期诸如“谁取代谁,谁消灭谁”的用语,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了。翻译也成为我们的常规工作之一。

以往的历史研究往往注重宏大叙事(宏观),将范围限定在政治和军事方面,而缺乏对实际发生事件的理论解释,进而将历史简单化、贫乏化。实际上,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生态学等学科的介入可以很好地解决中观和微观的层面。新的学术方法的引入也会重视“过程—事件”的动态研究,从而更好地在具体研究和全球视野的结合中来考察历史。《全球史与中国》中所收录的中外研究成就,往往是运用上述方法论在不同专题性研究领域的个案,力求给读者呈现出活生生的动态过程。此外,并不存在所谓单纯的事件史,历史学家必须在不同的时段中对错综复杂的事件作深层次的、结构性的分析。文化和科技方面的交流,往往是经济交流的附属品。因此,欧洲近代以来的贸易史,是裹挟着传教史、语言交流史、科技史、疾病史等内容一并到了中国的。实际

① 刘新成:《在互动中建构世界历史》,见《光明日报》2009年2月17日。

② 夏继果、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5页。

③ 梁启超:《读日本书目志书后》,见《饮冰室合集》第一册之“饮冰室文集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2页。

④ 徐光启:《历书总目表》(1631),见《徐光启集》,王重民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374页。

上,对全球史与中国各个研究方面的探讨,只有在对不同时空动态过程的具体考察中才能得到具体实现。同时基于全球史构建的中国与世界的关联也是双向的。尽管我们可能从广阔的视野和互动的视角来考察全球史与中国的各个方面,并将研究对象置于广阔的相互关系情境中来理解,但还没有到进行全程性、整体性研究的程度。全景式的宏大叙事只有靠后来学者的努力了。

三

尽管本刊名为《全球史与中国》,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研究都只是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的说明和阐发,很多的著作是把中国的事件、学说等作为出发点,来讨论历史、思想等方面的普遍问题。例如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柯文(Paul Cohen, 1934—2007)的名著《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1997)^①,实际上,想要处理的是有关在历史研究中个人记忆、集体记忆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

《全球史与中国》既强调翔实的史料,研究内容的拓展,也重视新的方法和学理的引进。在以往研究中鲜为人知的一手档案资料的运用和整理出版,特别是对藏在海外的史料、文献的系统发掘整理,是非常重要的。而理论方面,在方法论和视角上的创新和突破也是需要的。总之,突破以往的思维定式,运用多元的研究方法,强调去中心化和互动的观念,并努力挖掘出新的史料,是本刊的特点。正因为此,《全球史与中国》才可能会在读者那里产生令人称奇或引发质疑的思考。

2014年12月,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全球史研究院,我们当时就提出了要将研究院建成国际学者进行全球史研究的重要平台。在2011年新版学科目录中,首次将“历史学”下的“考古学”“中国史”以及“世界史”并列为三个一级学科。也就是说,在国内学科意义上的“世界史”实际上是“外国史”,因此,只有“全球史”才是欧美学科意义上的“世界史”,因为它不仅超越了国别史的视野,更重要的是从互动的角度来理解世界变迁的全球历史。我们清楚地知道,编辑出版《全球史与中国》,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时要求各个学科之间的合作,从而真正打破学科的单一界限和分类。

我们常常说“学术者,天下之公器”,意思是说学术是天下人所共享的财富,不应当以个人的好恶为转移,更不应当据为己有。全球史本来就是一个开放的研究领域,我们

^① 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中译修订版),杜继东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希望国内外在“全球史与中国”方面做出成就的学者,多多为我们提供优秀研究成就,并不吝赐教。因为除了神,没有谁能够具有全能的视角。

麦克尼尔认为,人类变通性的最终活力在于我们是否有能力去创造新的思想、新的经验和新的制度。但是,当与外来者接触,不同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由于受到关注而被迫彼此竞争时,同样也是这些创造最为兴盛的时期。^① 在接触和交流不再成为障碍的今天,我们希望《全球史与中国》真正能够促成中外学术在全球史与中国研究领域的互动。

^① 麦克尼尔:《变动中的世界历史形态》,见夏继果、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21页。

全球史与中国

—— 一种合乎时代的、探究世界发展的路径

[德] 腊碧士 罗颖男 译

所有人都以某种方式存属于这个世界,古代哲人对此早已知晓:希罗多德(Herodot,前490/480—前424)在《历史》中描述古希腊、司马迁(前145—前90)在《史记》中描述古代中国时,多少已经带有世界史的意向。在现代历史编纂学中,首先在西方产生了普世史,比如德国的黑格尔(Gottfried Friedrich Wilhelm Hegel,1770—1831)和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后来还有英国的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89—1975),魏源(1794—1857)和梁启超(1873—1929)则作为东方的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诞生了世界史,其基本思想在于,在开始进行历史描述时必须存在不同的人类自然物质基础: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1917—2016)和戴蒙(Jared Diamond,1937—)对此提供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范例。然而,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还处于普世史书写的背风面。这一情况随着中国几十年来经济和文化实力的增强而发生转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的全球史的历史学路径。正如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1952—)在其举世瞩目的著作《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Die Verwandlung der Welt. Eine Geschichte des 19. Jahrhunderts*,2009)中所强调的,全球史是一种全世界体系内部的互动史。全球史研究的是现代的相互纠缠的历史(entangled history)。为了胜任这一任务,全球史研究关注的不是整个世界,而是特定的区域、时代或对象。同时,全球史也希望能取代20世纪80年代之前占主导地位的“西方视角下的世界史”的叙述模式,即历史活动者和历史进程相互联系在一起,活动者和区域之间的互动占据决定性的位置。

一个合乎时代的全球史的基本特征内部包含一些特殊的设计和路径。最重要的在于,正如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所发现的,全球世界的基础早在公元前800至公元前400年便已开始形成。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在其著作《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1949)中将他的这一观察改造成当今著名

的“轴心时代”(Achsenzeit)概念(李雪涛中文译本《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艾森斯塔特(Samuel Eisenstadt, 1923—2010)则从轴心时代的原理返回到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发展出“多元现代性”的历史—社会学路径:在通向现代性的过程中,每种文化都有自身的发展道路、自身的发展速度,并以自身的文化条件和目标为基础。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1902—1985)——法国年鉴学派的重要学者之一,最终为普世史和全球史研究路径的全面性思考确定了不同的时间层面。

- 轴心时代的原理,
- “多元现代性”的概念,以及
- 不同时间层面的联合,

由

- 关于一种文化轴向基础的
- 地理—生物学基础
- 和长期的历史—文化影响
- 新近的各种历史背景

构成:在这一概念性和时代性的基础上,全球史的分析可以扩展至其历史的深层范围。

在全球史的理论、方法基础和研究路径方面,中国扮演着一个无与伦比的角色。中国是唯一一个从古代至现代未曾中断的并保存至今的高度文明的国家。正因如此,才产生了由许多哲人——从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到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和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强调并钦佩作为“异托邦”(Heterotopie)的“他者”(Otherness)的中国文化:中国是唯一一个在发展过程中保持独立且不依赖于西方文明的高度文明的国家。这建立在中国独一无二的地理—生物学前提之上,建立在其轴心时代的特征之上,建立在其历史上长期存在、至今依然发挥影响的社会要求之上。通过东西方的比较,中国和欧洲为我们呈现出一个研究领域,在对其历史差异的分析中隐藏着在不经意的过程中学会更好地理解全球世界的可能性:这是全球史研究的真正使命——关乎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共同命运。

北京外国语大学及其全球史研究院具备践行这一使命的独特条件。北外在世界语言的知识和教学方面具备国内顶尖、国际知名的高水平,不仅为学习语言,而且为通过翻译重要文本进而分析和理解各种文明,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在实际操作中,还涉及

组建一个包含中国/东亚和欧洲/西方学生、教授和学者的工作团队,能够将在极短时间内阐明的历史编纂学种类、具体课题的不同概念和方法论路径推向一个清晰的工作进程。比如,其中的一个具体课题是知识和技术的跨欧亚的迁移,这样的研究只有通过中期或长期规模的亚欧研究小组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这便是北外及其全球史研究院通过与东方及西方伙伴的合作所能开辟的途径。

衷心祝愿北外全球史研究院的创始院长——李雪涛教授,一切顺利,并取得成就!

[腊碧士(Alfons Labisch),医学博士、哲学博士、社会学硕士、法学硕士,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医学史荣休教授,德国国家科学研究院 Leopoldina 研究中心(德国,哈勒)主任]

[罗颖男,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德语地区中国历史研究的起源^①

[德]裴古安 韦 凌 译

摘要：启蒙运动期间，史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扩展对于人类经验的认知。16到18世纪之间，耶稣会传教士将中国传统史学介绍到欧洲，发现它与欧洲文化对于历史功用的理解异曲同工。总的来说，它陈述一些政府的案例，并对其统治的优劣加以评论。在试图使史学成为一个学术学科的过程中，欧洲尤其是德国史学家所面临的主要困难是评价来自异域的、关于一个古老文明的、远在《圣经》叙事的历史阶段之前的史料。至18世纪末，德国史学家对于中国史学一度高涨的热情日渐消退，而将其注意力集中于本国迅速发展的历史现实。对于历史学者而言，致力于鉴定一个“停滞不前”的民族似乎无法为在学界的成功奠定基础。一个多世纪以来，德国学术界对于中国研究作为一门学术学科一直怀着漠视的态度。直至20世纪初，中国在国际政治生活中重新成为令人关注的焦点，它才重又引起学者的兴趣。

关键词：中国学 汉学 启蒙运动 历史主义 科学史 历史学 世界史编纂

从欧洲第一次认识东亚到20世纪亚洲研究广泛地成为大学中的特殊学科，科学历史的发展与关于这些异国文化的知识的积累并无多少类似或平行之处。在德语区的范围内，对于评价有关东亚的知识来说，它们的作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即这些知识是否能够嵌入德语区相关的思想框架。观察中国研究的发展，不难看出，对于东亚在思想和体制方面的认知兴趣取决于传教的或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以及学术方面的目标。其结果是，关于中国的知识在不同的话语层面上得以体现。而德语区范围内对于有关中国的信息和中国形象的领会应该被看作欧洲文化史进程的一个部分。下面，本文将依历史顺序简要介绍有关中国的描述及其作者，重点在于有关中国历史的全貌的评论及其含蓄或

^① 题目原文：“Zur Chinarezeption in der europäischen Aufklärungshistoriographie”，见：《波鸿亚洲研究年鉴》（*Bochumer Bochumer Jahrbuch zur Ostasienforschung zur Ostasienforschung*），第10卷，1987：59-323页。

明确的比较视角。

早期形态——早期汉学

早在 15 世纪时,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约 1324)《游记》的德译本第一次给德国读者留下了关于中国的深刻印象^①。书中描写中国形象的字里行间浸透了作者对于高度的中华文明的极度称颂^②。除宗教方面外,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同样发达,甚至可能比欧洲文化更为发达的假设,也得到 17 至 20 世纪中国形象最具影响的传播者——旅居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的证实。然而,对于儒家思想引领下理所当然的中央集权传统帝制,他们则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批评的态度。尽管利马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并未能够进入中国的宫廷,但他将中国的部分哲学思想传播到欧洲。在他眼中,这种哲学思想是这一管理有序的帝国的思想基石。直到他的继任科隆人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2—1666)才最终凭借他先进的天文知识和军事技术成功地进入了中国宫廷。利马窦的《中国札记》(*Historia von Einführung der Christlichen Religion, in das grosse Königreich China*)的德译本于 1617 年出版^③。书中有关中国历史的内容寥寥数语,仅占全书的 2.4%^④。

受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的委托,奥古斯丁会教士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za,1545—1618)完成了第一篇以中国历史为主题的报告。他将欧洲当时所存文献中有关中国历史、国家体制、宗教和风俗习惯的资料编纂成《中华帝国奇物罕习史》(*Geschichte der höchst bemerkenswerten Dingen und Sitten im chinesischen Königreich*)。书中还列出了中国帝王朝代年表,年表始于据他认为公元前三千多年统治中国的传奇皇帝尧。该书出版四年后,德译本便于 1589 年问世刊行^⑤,并成为欧洲启蒙运动中知识分子的畅销书,为中国热的兴起奠定了基础^⑥。欧洲读者的兴趣中心首先集中在中国的文明成就方面,这使他们感到在世界的另一端还存在着“第二个欧洲”。在

① Marco Polo, *Il Milione. Die Wunder der Welt*. Übers. v. Elise Guignard, Zürich: Manesse, 1983.

② Reinhold Jandeseck, *Das fremde China: Berichte europäischer Reisender des späten Mittelalters und der frühen Neuzeit*, Pfaffenweiler: Centaurus, 1992, S. 31–45.

③ Matteo Ricci, *Historia von Einführung der Christlichen Religion, in das grosse Königreich China*... Köln: Hierat, 1617.

④ Reinhold Jandeseck, *Das fremde China: Berichte europäischer Reisender des späten Mittelalters und der frühen Neuzeit*, S. 288.

⑤ Juan Gonzales de Mendoza, *Die 'Geschichte der höchst bemerkenswerten Dinge und Sitten im chinesischen Königreich' des Juan Gonzales de Mendoza. Ein Beitrag zur Kulturgeschichte des mǐng-zeitlichen China*, hrsg. v. Margareta Griessler, Sigmaringen: Thorbecke, 1992.

⑥ 见 Griebler 在 de Mendoza 最新译本中的前言; de Mendoza, 1992。